



风声·雨声·读书声

少年时代默记的那半句对联，成为我人到中年的文章集名，是喜是忧，已无从说起。只想问：是否还有同道者，还在世间怀念那副对联？如有之，且让我们再一次拍栏吟诵——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朱学勤 ●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朱学勤 著



风声·雨声·读书声

FENGSHENG YUSHENG DUSHUSHENG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声·雨声·读书声/朱学勤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300-12711-8

- I. ①风…
- II. ①朱…
- III. ①思想史-中国-文集
- IV. ①B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9549 号

风声·雨声·读书声

朱学勤 著
Fengsheng Yusheng Dushushe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1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12 插页 2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77 000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自序

问学十年，聚散离合；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在这本小集得以出版之际，我不能忘怀我的三位导师：硕士导师何汝璧、博士导师金重远、博士答辩委员会主席王元化。在我艰难困厄的时刻，他们接纳了我，保护过我。

同时，我也应该感谢诸多读者朋友。他们多是一些素不相识者。我只能从来信中知道人心未死，还有那么多善良的目光在互相关注、互相叮嘱。

文章历时逾十年。写作时，不曾为今日留有余地，故而随兴所至，分散漫漶，以致今日结集出版，如何想一个集名反成了一个难题。几番斟酌，只能从少年时代默记于心的那首对联中截出半句——“风声、雨声、读书声”移作集名，似乎只有这三种声音，能够呼应这十余年我内心不断回响着的另一种声音。

我服膺梁漱溟先生所言，知识分子可分为两种人——学术中人与问题中人。我永远敬重前一种人，本身却受性情局限，大概只适宜做后一种人。所谓“问题意识”，我这一代人多发轫于“文化大革命”后期，先觉者觉醒于1968年的思潮辩论，后觉者也不会晚于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那时我们曾以贫弱的学力、旺盛的体力，在私人场合热烈争辩那些激动人心的问题。我后来选择文科院校以及思想史专业，更多的动力也是来自“问题意

识”，而不仅仅是单一的学术兴趣。以“1968”命名的这一代人，后来发生了很大的分化，只有少数人侥幸走进了文科院校。即便如此，后一部分人愿意兼顾学理与“问题”，同时并进者也不多了。每念及此，内心不胜苍凉：当年以非知识分子身份，思考正常环境下只有知识分子才能思考的问题，当然是历史的扭曲，但也锤打出这一代人的思想生命；如果在获得了知识分子身份之后，直奔学术前程，放弃了当年的“问题意识”，岂不是买椟还珠，堪称一代人的思想悲剧？

问题不在于“问题”。当年那些“问题”都会发生变化，也应该变化。但是，面对现实，坚持追问，这样的“问题意识”却不应该放弃。我试图拖着“问题意识”在学术环境中行走，既要发展，又要自我批判。走了十年，确很吃力，吃了一些苦头，也有一点收获。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可以说，是十余年磨炼尚未修成正果的涩果：既有坐冷板凳写出的学术论文，也有破门而出的各种议论。论文从潘恩开始，经过卢梭、顾准，还有新儒家，反映了我在学理层面的思索。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其间有自我淘洗，淘洗这一代人精神生命的思想线索。至于各种议论，以书评为主，则是另一类文字。如果说学术论文写作时，我必须克制自己，那么后一类文字则较多感情色彩：“笑着的”，“叫着的”，还有“哭着的”。如《随风飘去》，文字虽短，包含的苦闷、愤懑却很浓重。那是一种“悲愤中的笑”，只有特殊的氛围，才会产生那样特殊的面容、特殊的文字。《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则是“叫着的”文字，当时年轻气也盛，曾痛痛快快地叫了几声。至于《地狱里的思考》，从题名可以想见写作时的心态：哭悼顾准先生之早逝，亦写出近些年面对虚无主义思潮，我对另一种情怀的怀念。那样的情怀，那样的知识分子，不会有好报，得到的总是“迟到的理解”。然而我深信，他们是生活中的“盐”，永远不会过时。

生于这样的时代，不会有好心情。少年时代默记的那半句对联，成为我人到中年的文章集名，是喜是忧，已无从说起。只想问：是否还有同道者，还在世间怀念那副对联？如有之，且让我们再一次拍栏吟诵——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谨以此，敬献我的读者。

朱学勤

1993.12.10

目 录

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 / 1

为学不作媚时语

——读王元化《传统与反传统》 / 8

是社会批判，还是政治参与？

——关于张闻天的悲剧与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问答录 / 11

终极关怀

——汉民族政治文化的基因缺陷 / 21

随风飘去

——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 31

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 34

毛泽东晚年文化思想散论 / 44

六十年代的教育危机与八十年代的语言破译 / 55

问答录 为什么要对比研究“文化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 / 61

启蒙三题：笑着的、叫着的、哭着的 / 70

两个世界的英雄

——托马斯·潘恩 / 78

托马斯·潘恩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 / 95

让-雅克·卢梭和他的恋母情结

——兼论某种文化现象 / 110

教士与帝国一致的制度

——卢梭政治哲学评析 / 122

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

——新儒家政治哲学评析 / 146

迟到的理解 / 164

地狱里的思考

——读顾准思想手记 / 172

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

普鲁士的专制制度是对作家内心不自由的惩罚。

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胡风如此，胡风为之执幡护灵的鲁迅也是如此。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需要悲剧，知识分子更需要悲剧。一个时代没有悲剧，才是真正的悲剧；有了悲剧，知识分子竟如妇孺般哭成一片，又是对悲剧尊严的辱没。

对悲剧尊严的辱没岂止从今日开始？

1986年8月一个炎热的夜晚，巴金提笔祭奠自己的亡友——胡风。这个八十多岁的老人颤巍巍地说：

在那一场“斗争”中，我究竟做过一些什么事情？我记得在上海写过三篇文章，主持过几次批判会。会开过就忘记了，没有人会为它多动脑筋。文章却给保留下来，至少在图书馆和资料室。其实连它们也早被遗忘，只有在我总结过去的时候，它们才像火印似地打在我的心上，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说：“不许你忘记！”我又想起1955年的事。（巴金：《随想录·无题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955年发生了什么事？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把另一个知识分子多年来给自己的私信统统抖落出来，提供给当时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几家报纸之一——《人民日报》，制作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第一批材料。接着，政府查抄胡风私宅，把更多的私人通信公之于众，并且分门别类，加上按语，抛出所谓第二批、第三批材料。然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一哄而起纷纷“向井口投掷石块”（巴金语），争先恐后地在那家报纸或其他报纸上发表讨伐胡风的文章，咬牙切齿，声声可闻。那两个月里发生的事情都辑录在《人民日报》上。翻一翻这家报纸1955年5月至6月的合订本，后代人既为那三批按语无限上纲罗织文网的强横逻辑而感到震惊，也为当时知识分子同类相残的可耻记录而感到羞耻。请看这些文字：

看了《人民日报》公布的第二批材料后，愤恨的烈火把我的血液烧得滚烫。

我看穿了胡风的心；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谁会这么想一想呢？

胡风，你是九尾狐，你的主子是谁？当胡风向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了猖狂进攻以后，不久就传来了台湾广播热烈的响应。

请依法镇压胡风，而且镇压得必须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

胡风娘家是中美合作所……他们不仅是狼种，而且似乎又当过狐狸的徒弟……要彻底消灭这批狼种。

胡风是反革命的灰色蛇，胡风与胡适的区别是一种灰色蛇与白色蛇的区别。

上述语言的作者，既有刚陨落不久的一代文坛巨擘，也有至今还饱享盛誉的人民剧作家；既有当时曾轰动一时的山药蛋派作家，也有直到现在还当之无愧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当然，也少不了后来被称之为反革命文痞的姚文元。然而，在这么些文字中，后来的读者能猜得出哪一句是出自姚文元之口吗？你拣最丑恶的猜，也会猜错。悲剧不在于谁比谁丑恶，而在于

后来的迫害者与被迫害者在伤害最早也是最优秀的一个殉道者时，竟使用起同一类语言！

人常说，那三批按语是后来一切整人哲学、整人语言的开始，但是忘了补充一句：围绕三批按语发表的那些文章也是后来街头大字报语言的开始。这类文章，尤其是这类文章所使用的思维方式与日后红卫兵的语言、红卫兵的思维方式有什么差别呢？“狼种”、“狐狸”、“九尾狐”、“彻底消灭”、“严厉”“镇压”，十余年后，红卫兵毫不犹豫地代之以“牛鬼”、“狗崽”、“炮轰”、“砸烂”！早在红卫兵学会糊大字报以前，大字报的语言不就已由他们的先辈准备好了吗？区别在于红卫兵使用这类语言，是由他们的教育决定的，而前一代人开创这类语言，则是由更为可悲的劣根性决定的。红卫兵从学会读报那天起，接受的就是这种语言教育。他们只有这一种语言，没有人教他们第二种语言。灾难过后，他们当然要低头忏悔，但他们至少还可说一句：“我们的罪过是无知，而不是虚伪！”一代文化巨擘，还有这个“家”，那个“权威”却不一样了，他们是说着另一种语言长大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曾经亲履西土，受过系统的民主教育，起码是文明教育。他们应该知道使用这种语言，远远超出了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规范。这不是文明人使用的语言，谁使用这种语言，谁首先就剥夺了他自己的内在尊严。当红卫兵忏悔的时候，他们也应该忏悔，甚至更应该忏悔！因为他们当时就应该知道使用这种语言，不是出自野蛮，就是出自虚伪，因而，也就更应该承担良心上的责任。

“狼种”、“九尾狐”、“灰色蛇”、“白色蛇”——一场真正的理论冲突和政治悲剧就是被这种几乎是村妇相诤的语言辱没了，冲淡了，冲淡成丑剧，然后，再向外蔓延，越出“胡风事件”的个人范围，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足够污染几十年文化氛围的空间内收敛还原，还原为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大悲剧。当后代人重读那三批按语和那一批文章时，将难以抑止内心泛起的强烈的厌恶之情。人们甚至会这样说，连“丑恶”都可以分出档次：那三批按语虽然强横，却还留有强横者的气势，强横者的文采，尚可称“恶而不丑”；而一批助恶帮闲的文章呢？则落入更低一个阶次。它们虚假到了极点，也虚弱到了极点，助恶无作恶之“力”，助恶无作恶之“美”，只能称为“丑而不恶”！

需要付出多么沉重的心理代价，后代人才能相信这就是我们中国唯一受过民主教育的那个阶层在当时使用的语言？等到这个阶层都已习惯于使用这类语言时，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费希特有言：“基督教创始人对他的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德]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中国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就是这样开始的。1955年反胡风，1957年反右，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一场接一场如雪崩般发生。整个社会像被人在山巅上推下的巨石，迅速向下滚动，直到最后滚入教育、文化、伦理乃至文明规范的崩溃深渊。从这场灾难中过来的一些知识分子现在都已学会如何控诉这些不公正的事件了。但从50年代中叶那次可耻的投降以来，他们哪一天不是在虔诚地等待这一切，召唤这一切，甚至参与制作这一切呢？他们掘土埋葬同类，随之亦挖出了自己的墓穴。五五年卖友求荣者，五七年落网；五七年漏网偷生者，六六年一网打尽。真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会有人出来说，这是违心的，那是被迫的，请宽恕知识分子在高压下的不光彩行为。即以胡风为例，他们承受的政治压力再高，也高不过胡风身为囚徒在监狱中的生死压力。1966年夏，胡风尚在服刑。官方来人要他揭发周扬问题，威逼兼利诱。人们都知道胡风与周扬宿怨已久，其锒铛入狱的悲惨遭遇与周扬不无关系。此时胡风揭发周扬，无论如何都不为过；此时胡风不揭发周扬，则可能加重刑期，甚至被推向极刑。是报复宿敌，以求获得“正当”的自由？还是顶着压力，甘冒生死之祸，保全一颗知识分子的良心？胡风的态度是：

不管报上说得怎么吓死人，我应该有我自己的看法，决不在这里为某个人说一句坏话或一句好话，问题是怎样就说怎么样。今天，周扬虽然被拎出来示众了，但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像这样来批周扬他们，是言过其实的，难以服人。（梅志：《胡风传》，载《文汇月刊》，1987年9月号）

一个囚徒在生死关头作出的回答，将使无数养尊处优者的所谓“违心之论”无地自容。这个囚徒不愧是鲁迅亡灵的护送者。当年那面护灵幡旗——“民族魂”只有在他这里才重放异彩。在这之后，这个囚徒因为他这种不与恶势力合作的精神吃够了苦头，饱受摧残，最后成了“一个神情木然的病人”（巴金语）。也许他是被剥夺了外在的尊严，但是他的内在尊严将永存。而其他人呢？还是费希特说得好：“一个丧魂落魄、没有神经的时代受不了这种感情和感情的这种表现，它以犹豫忐忑、表示羞愧的喊声，把它自己所不能攀登的一切称为狂想，它带着恐惧的心情，使自己的视线避开一幅只能看到自己麻木不仁和卑陋可耻的画面，一切强有力的和高尚的东西对它产生的影响，就像对完全瘫痪的人的任何触动一样，无动于衷。”（[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

还是回到巴金这里来吧。在那个炎热的夜晚，这位老人接着又说：“我翻看当时的《文艺月报》，又找到编辑部承认错误的那句话。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在一个没有罪感氛围的轻浮国度里，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老人完全可以带着他的隐私或污迹安然离去，不受任何谴责。现在，他突然觉得自己的灵魂中有罪恶，不吐不快，终于说出了这一番富于忏悔意识的语言，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再造的开始。但也仅仅是开始。不幸的是，忏悔刚一举步，立刻就被一大片溢美之词甚至是阿谀之词包围了。有人说“这是中国散文的巅峰”，又有人说“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等等，等等。相比世界历史上其他民族——远如德国的，近如俄国的——在大灾大难之后，知识分子灵魂拷问的惨烈程度，我们这个民族实在是不可救药。浅浅地扎一针，都要撒上大把大把的麻药，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儿童心理症，还是他们确实患上了老年衰弱症？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

代。悲剧在不断发生，悲剧意识却被种种无聊的吹捧、浅薄的诉苦或者安慰所冲淡。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这才是悲剧的真正悲哀！在这片乐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的土壤上，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不见有“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一个民族只知控诉，不知忏悔，于是就不断上演忆苦思甜的闹剧。从前是目不识丁的底层文盲。现在则轮到知识分子，这个“家”，那个“权威”。他们中的很多人将终生念叨某年某日某人某张大字报中的某句话曾加害于己，却拒绝回忆自己远比红卫兵更早就使用过红卫兵的手段伤害过远比自己优秀的同类。他们的“控诉”实质上是一种可怜的补偿要求，而不是那种高贵的正义之情。所以，他们从来只控诉别人对自己的不公平，却绝难控诉自己对别人的不公平，尤其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因此，在这个拥挤的国家里，你绝难看到有左拉式的人物左拉式的控诉——为素不相识者的冤屈而控诉，为社会良心的沉默而控诉。那才是真正的控诉。什么时候能听到有我们自己的左拉，在十里长街长啸一声：“我控诉！”什么时候这个国家才真正有拯救的希望。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外界不公正事件持续发生时，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也在持续发生一种隐蔽的、却更为可怕的裂变。我们对前者已经谈论得够多了，但对后者却谈论得太少，太少。让历史学家去争论外界压力与内心崩溃孰先孰后孰果孰因的关系吧。而在人类真正的良心法庭前，区别真诚作家与冒牌作家的标尺却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他是否具有起码的忏悔意识。没有忏悔意识的作家，是没有良心压力的作家，也就是从不知理想人格为何物的作家。从前他们没有理想人格的内在压力，当然就无从抵抗外在压力。一代博学鸿儒无可挽回地跌落进犬儒哲学的怀抱。现在他们没有理想人格的内在压力，当然就迷走于补偿性的外向控诉，却躲避内向忏悔，躲避严酷的灵魂拷问。世界史上的优秀民族在灾难过后，都能从灵魂拷问的深渊中升起一座座文学和哲学巅峰，唯独我们这个民族例外。没有卢梭的《忏悔录》，就没有18世纪法国浪漫文学的先河；没有托尔斯泰从忏悔走向《复活》，就没有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巨大成功；没有萨特对沦陷时期巴黎知识分子群的《恶心》，就没有20世纪西欧存在主义文学与哲学的双

向丰收。还记得萨特是怎么说的吗？——

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对一切未能挽回的事实负责。

让我们的知识分子继续控诉吧，控诉者将注定永远停留在被控诉者的水平。我们还会不断地出“诗人”，出“作家”，却绝不会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罗曼·罗兰，出托尔斯泰！

本文初次发表于《书林》，1988年10月号，
《解放日报》1988年10月29日、
《文摘报》1989年1月8日、
《当代思潮》1988年总第22期转载

为学不作媚时语

——读王元化《传统与反传统》

书名题为《传统与反传统》，收录作者近年与台湾学者林毓生辩驳五四精神的有关论文及其他笔记、散论等二十二篇。这是一部启人深思的论集。

1987年作者答记者问，他重申三十年前即为此罹祸的“向着真实”之主张：“这样简单的道理本来是不言自明的，可是，我们却需要卜昼卜夜地大声疾呼，来为这样平凡的真理去说明，去申辩。”

1988年接待电台编辑采访，他又举罗曼·罗兰为例：“罗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超越混战，发表了精神独立宣言。后来他在答苏联作家格莱特考夫的信中，又宣称自己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可是谁都不会怀疑以个人主义自命的罗曼·罗兰具有最强烈的爱人类、爱真理、爱进步的群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我实在害怕并反感文坛上那种一窝蜂的风气，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保持独立见解，‘为学不作媚时语’，不媚权势，不媚平庸的多数，也不趋附自己并不赞成的一时潮流。”

这种精神，中国人称之为真性情。为了这种真性情，一个人可能会付出代价。在该书附录中，记有这样一件往事：1955年，王元化被卷进“胡风集团”一案时，他与胡风关系不深，只不过当时坚持认为那样处理胡风有失公正，才从“认识不端正”、“态度不好”升级，被定为该集团“骨干人物”。他当时确有机会解脱，却被他自己断然拒绝，结果被戴上了“反革命分子”

帽子，被开除党籍，行政连降六级！

在当代士人以策略代道德者看来，这种选择简直是“拎不清”，不可理喻。而在一派严肃的老学者看来，不可理喻者，不可利喻也。圣贤作书，所谓千言万语万语千言，不就教人一个“义利之辩”？“辞交取予之间，皆有耻之事也。”人生吃紧之处，往往就在这种似可便宜行事的地方。守一步，有耻无愧；退一步，有愧无耻。一步提拎不住，步步失格失节。从此一生，即如朱子所言：“顷刻放宽，便随物流转，无复收拾了。”

在这方面，林毓生尽管与王元化有学术之争，但在论述其先师殷海光一生的道德成就时，有一段悼词，椎心泣血，极为恳切，与隔岸学人反而有心心相通之处。那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任何人如要在学术上有重大成就，都必须有一种不顾一切，专心于研究的能力。在今天苦难的中国社会，一个人如能如此专心，必须相当的自私。自私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损人利己的鄙劣行为；另外一种是对外界也有同情心，并不损人利己，但想到自己的工作和自己做研究的时候，均能暂把外界的苦难忘掉，或对外界的苦难变得漠不关心。如此专心致志，积年累月，也许有重大学术成就的希望。而殷先生看到听到社会上的不平即热血沸腾，他炽热的心，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苦难的中国。他经常处在道德愤怒与纯理追求的两极所造成的“紧张”心情中，在强烈的道德热情呼唤之下，他不可能为学问而学问。以殷先生之天赋为学之诚笃，如能稍减其对社会的关切，在一个学术空气流通的地方，积十年之力，是不难有重大成就的。易言之，他之所以在学术上没有获致原创成就，正是因为道德成就过高的缘故。

身为社会道德的立法者，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又怎么能“稍减其对社会的关切”？有大感触大悲怀者，方能有大襟怀大境界。而中国文化的至高至上境界，本身就不是一个学术境界，而是一个道德境界。儒家曰成圣成贤，道家曰成真人成至性，佛家曰成佛成菩萨，儒、道、释三家不正是在这里相